

供批判“四人帮”参考

“四人帮”在教育战线 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

(初 编)

一九七七年五月

为了揭发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利用教育阵地进行篡党夺权以及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肃清他们在教育战线的流毒，我们初步摘编了这个材料。这个材料是在今年二月份编成的，后来又作了一些补充。由于时间匆忙，材料不全，编写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仅供同志们参考，并请提出意见。

教育部大批判组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

目 录

一、 妄图把教育阵地变为“四人帮”篡党夺权、 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1
(一) 要把教育战线抓在“自己手上”	2
(二) 直接操纵两校“大批判组”，控制和插手一些单位，为 他们篡党夺权服务.....	4
(三) 插手科教组 and 篡夺教育部的领导权，妄图把黑手伸向全 国.....	13
(四) 大抓所谓“复辟”事件，大树所谓“反潮流”的典型， 妄图大乱无产阶级天下.....	17
二、 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 路线.....	23
(一) 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其实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 论”，向无产阶级进攻.....	23
(二) 打着“反走资派”的旗号，其实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	25
(三) 打着“反潮流”的旗号，其实是反马列主义的革命潮流.....	28
(四) 打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其实是扩大资产阶 级法权.....	32
三、 篡改毛主席教育革命理论、方针和政策，大 搞形而上学，破坏教育革命.....	34
(一) 修正马列主义的教育革命理论.....	34
(二) 篡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教育方针.....	38

（三） 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青少年.....	40
（四） 反对为革命学文化.....	43
（五） 篡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把开门办学引向邪路.....	54
（六） 破坏革命的师生关系.....	59
（七） 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62
（八） 反对党的领导.....	66

一、妄图把教育阵地变为“四人帮”篡

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按：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伟大导师列宁也曾指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妄图控制教育阵地，破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改变教育的无产阶级性质，使教育成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十大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他们转移批林批孔大方向，大反经验主义，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以及在毛主席逝世前后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都利用了教育这个阵地。“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谢静宜直接操纵两校“大批判组”，炮制了大量黑文章，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在清华大学私设秘密联络点，八方串连，到处煽风点火。他们利用在教育战线窃取的那部分权力，妄图把黑手伸向全国。他们在教育战线兴风作浪，大抓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和北京永乐中学等所谓“复辟”事件，大树张铁生等所谓“反潮流”典型，同他们篡党夺权的活动相呼应。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时期的敌我关系，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妄图大乱无产阶级的天下，以便乱中夺权。总之，他们根本不是搞教育革命，而是利用教育阵地搞反革命。

（一）要把教育战线抓在“自己手上”

其实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了。

（张春桥 1976 年 9 月 29 日的一次谈话）

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

（江青 1967 年 4 月 12 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如果我们掉以轻心，……领导权还可能从我们手中丧失掉。

（徐景贤 1973 年 1 月 2 日在华东七省、市教材改革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要象江青抓样板戏那样抓教育。

（毛远新 1974 年与×××的一次谈话）

列宁讲“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到现在还刺痛走资派，刺痛与走资派利益一致的（人）。

（迟群 1976 年 8 月 28 日在两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要注意大问题。社会上一股风，一点感觉没有？

教育部怎么得了呢？一点风就要翻，顶不住。

（张春桥 1975 年 11 月 22 日的一次谈话）

主要是各级领导要研究，为什么风一来顶不住？要从世界观上找原因，不然，出来李大平、张小平还是顶不住。

（迟群 1976 年 8 月 19 日在教育部全体人员大会上的讲话）

我在清华说过，象这样的大学过两年就要抓一次右派。特别是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大学。

（迟群 1973 年 8 月 3 日在北大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我们反击了，这个舞台就让你（注：指张铁生）来占领。

（迟群 1976 年 2 月同张铁生的一次谈话）

现在，我们正以动大手术的精神，一动到底，决不留后遗症。

（张铁生 1976 年 2 月 10 日在太原市滨湖会堂的讲话）

【批注】

“四人帮”要把教育战线抓在“自己手上”，这是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他们打着列宁讲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旗号，为的是掩人耳目，实际上是要使学校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为什么他们总耽心“社会上的一股风”？为什么怕风一来“顶不住”？难道他们是要顶右倾翻案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吗？绝对不是。他们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们打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号，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他们所谓的“风”，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和斗争；他们所谓的“顶不住”，就是怕失去窃取到手的那部分权力，怕打乱了“四人帮”的阵脚。为此，他们要拚命加强对教育部门的控制。要各级干部“从世界观上找原因”，就是要进行思想上的统治；要从组织上“动大手术”和两年“抓一次右派”，就是要在学校全面“夺权”，实行法西斯专政；让张铁生这样的反革命小丑占领教育“这个舞台”，就是要在教育战线上实行反革命复辟。粉碎了“四人帮”，

我们一定要把教育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使学校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二）直接操纵两校“大批判组”，控制和插手一些单位，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

“四人帮”特别是大野心家江青，把两校“大批判组”作为他们的地下伪中办，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两校“大批判组”不但篡夺了中央办公厅选送文章和印刷材料的部分权力，而且私自处理全国各地来信，充当江青的耳目、跟班、侍从和打手，是“四人帮”的顾问班子、秘书班子和情报班子。

（摘自北京大学《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初编）》）

“四人帮”在四届人大前夕，以江青秘密组为中心，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狂呼“要有一个法家领导集团”，“在中央主持工作”。“四人帮”的宣传机器两校“大批判组”全速开动，大造舆论，说什么这次“要出一个女总理”，迟群“要出任副总理”。

“四人帮”和迟群、谢静宜把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看成他们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就玩弄吴王刘濞“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对周总理发动了猖狂进攻。一九七四年九、十月间，江青在派王洪文向毛主席诬告周总理的同时，指挥两校“大批判组”大批“因循守旧”。迟、谢在布置这个“任务”时，疯狂叫嚷：“要向权威挑战”，“要发动一个比批林批孔还要大的运动。”“大批判组”集中力量，炮制了《批判因循守旧，坚持继续革命》的反党文章。这篇文章姚元文三次审稿，从标题到内容改动达 39 处之多，使之更为露骨地攻击周总理。

（摘自北京大学《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初编）》）

江青两次接见“梁效”说：现代的儒“有学者的儒”，有政治的儒；“蒋介石是大儒，党内也有大儒。刘少奇、林彪是大儒，党内还有大儒。不然，为什么搞这么大的运动？”

（摘自 1977 年 1 月 23 日《北京日报》《“梁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

必须批判“因循守旧”；

评孔丘的“仁”。

以上只是初步方案，当否，请阅示。

此致

敬礼

小谢、迟群

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十日

另，此外，还议了一些题目，后考虑先报这几个。

（迟群、谢静宜 1975 年 1 月 30 日给姚文元的信）

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是“四人帮”通过迟群、谢静宜直接控制的反党夺权的舆论工具。三年来，共发表了约 168 篇文章。其中，由江青点题的有《孔丘其人》、《批因循守旧》等。所谓《批因循守旧》，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由江青授意写成的有《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法家人物介绍吕后》等，名为吹捧武则天、吕后，实为江青篡党夺权大造舆论。《光明日报》十月四日抛出的《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矛头指向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两校“大批判组”王世敏 1976 年 1 月 13 日的交代）

我们学校对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是学校地位，而且培养的人是造走资派反的。

（迟群 1976 年 10 月 6 日与×××、×××的谈话）

我们的大学，就是培养造反派，培养革命火种的。造走资派的反。

（迟群 1976 年 9 月 20 日同中国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教育代表团和复旦大学访罗马尼亚代表团的讲话）

七五年十一月，姚文元通过他控制的某刊物，组织两校“大批判组”炮制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作为“四人帮”搞乱教育界的所谓“指导”文章。这篇文章为他们在各地的亲信视作“大进攻的信号”。接着，姚文元与迟、谢合谋由两校“大批判组”炮制了《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文，并把中央首长听取科学院汇报时的插话交给他们作为批判靶子，发出了在科技战线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夺权的反革命信号。在此之后，他们又炮制了《否定文艺革命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用以左右文艺界的运动。……接着他们又根据“四人帮”的反革命部署，由“梁效”和某报联合组织班子密谋炮制出《评“三项指示为纲”》，发出了在各条战线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全面夺权的反革命号令。

（摘自北京大学《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初编）》）

周总理逝世后，迟群、谢静宜让两校“大批判组”在他们编的语录和材料中别有用心地加上列宁关于哭丧妇的语录。……并指使“大批判组”写了一篇《孔丘之忧》的杂文，歇斯底里地狂叫：“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以最恶毒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总理和为失去自己的好总理无比悲痛的革命人民。

（摘自北京大学《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初编）》）

迟群、谢静宜在得悉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的消息后，在两校“大批判组”一唱一和地说：“把他先放在这个岗位上”，“张春桥在党内一样起作用”。四月份，根据毛主席提议，中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迟群又在“大批判组”说：“右派可以利用毛主席的一些话得势于一时，但是左派一定能够利用毛主席的另一一些话把他们打倒”，“现在是不是可以说，左派已经组织起来，并把右派打倒了？还不能这样说。”恶毒地攻击华国锋同志。

（摘自北京大学《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初编）》）

……清华收到全国各省市几千封来信。迟群几次说：“凡是各地送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件，不要急于转中办。我已经和中央首长（注：指‘四人帮’）打了招呼，他们也同意。你们摘录后，连同原件一起送我，原信由我和谢静宜转。”迟群还说：“要注意收集‘大家伙’的材料。”先后收集过中央政治局两位领导同志以及福建、河南、河北、山东、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政委等一大批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直送“四人帮”。

六月下旬，迟群下令出《群众来信来访摘报》。九月中旬，迟群又下令“精选”出综合材料，比较系统地整了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黑材料”。迟群还把新华社编的“国内动态清样”交给别人摘录补充，并于十月三日深夜催促要“加快整理。十月四日，迟群急急忙忙地要走这份材料。

（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吴敏生 1976 年 11 月 12 日的揭发交代）

两校“大批判组”以帮助江青抓“点”为名，先后到一些部队搜集军内情况，大搞反军乱军活动。一九七四年六月，大野心家江青带着两校“大批判组”部分成员窜到××军×连。在次“同乐会”上，江青胡诌了一首反动诗：“×××军战斗队，能文能武啥都会，能文赛过汉隋陆，善武灌周吓得退”，妄图拉拢和煽动部队为她篡党夺权效劳。

（摘自北京大学《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初编）》）

江青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来到清华，具有重大的意义。你们分校承担了非常重大的政治任务，它的意义之大将来你们就会了解了。

（迟群 1976 年 9 月 29 日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的一次讲话）

七四年七月朱永嘉布置写一篇关于吕后的文章。提出三点要求：一、要阐明一条正确政治路线得到贯彻，必须有忠实的继承者。吕后是刘邦法家路线的忠实继承

人，她是按照刘邦生前已定的法家政治路线办事的。二、吕后是了解刘邦最深的，追随刘邦最紧，与刘邦共同生活最长。刘邦所建立的功绩是与吕后的协助分不开的。三、西汉初期，刘邦的继承人除吕后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成刘邦的未竟事业。要特别地突出吕后杀韩信的英明果断和非凡的才智，同时要颂扬萧何等人的功劳。文章的落脚点要暗示江青是唯一杰出的正确路线的继承者。

（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一同志揭发）

“四人帮”为他们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野心家江青在一九七六年八月，窜到北大下达黑指示，要搞千万次计算机，叫嚷：“说了大话要兑现，你们要争气。”公然和当时华国锋同志等几位副总理批准的科学院负责研制千万次计算机的项目唱对台戏。

（北京大学教育革命部揭发）

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曲学校的同志揭发说，“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强令学校对学生进行“无限忠于江青”的教育，“培养对江青的感情”。他们令人作呕地提出，“要把这种感情的培养贯穿到每一堂课，每一分钟。”新生入学的第一课，便吹嘘江青的所谓“功德与关怀”。考场上贴江青的“语录”，学生有什么“错误”也要检讨“对不起江青”。

（摘自1976年12月17日《文汇报》《万众一心征腐恶》）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把他们伪造的什么“按既定方针办”，说成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制造了一个政治大阴谋。……在九月十六日社论上刚抛出，迟群就大讲：“今后的斗争就是围绕着按不按‘既定方针办’的斗争”，并与《光明日报》××一起，指挥两校“大批判组”合谋炮制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株大毒草。除了十月四日这篇反党文章之外，这段时期两校“大批判组”还有七篇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其中最为恶毒的一篇是《邓小平路线是林彪路线的继续》。

（摘自北京大学《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之一》）

“四人帮”那两个心腹还在清华园里施展一切手段，宣扬所谓围绕“按既定方针办”所展开的斗争，煽动群众怀疑和反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九月十五日晚，“四人帮”的一个心腹，急不可待地几次打电话给报社催要十六日社论的小样，叫人用电话在那边一字一字地讲，这边一字一字地记；之后，又连夜组织学习讨论。他散布什么：毛主席逝世后，出现了新的阶级斗争动向，“围绕‘按既定方针办’的问题，有激烈的斗争，有人要跳出来歪曲、篡改、修正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摘自1976年12月4日《北京日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动员令》）

一九七一年以来，朱永嘉秉承张春桥的黑旨意，打着编写高等学校教材的幌子，以“复旦大学中共党史教材编写组”的名义编写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编党史。他们在《党史讲义》中抹煞周恩来同志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无耻吹捧反党分子江青、姚文元等，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据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中共党史材料》编写组揭发）

一九七六年八月底，朱永嘉秉承姚文元旨意，要求提前出版战后历史长编（1956年分册），编纂《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下令上海师大历史系抽调人员，立即集中赶写，明年一月完稿。毛主席逝世后，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说“这项任务的现实意义更明确了，当时姚文元是知道主席健康状况的。”十月十一日，又对编写人员说：“要重点写马林科夫个人动摇，丧失革命气节的问题。”十三日又匆匆忙忙来说要写“贝利亚政变”，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并再三叮嘱：“这些话一律不要对外讲。”这是姚文元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又一罪证。

（据上海师大历史系世界史组揭发）

重新编一套教材下去，文字功夫花得很大，但把握性不大，不容易很准确地表达，可利用原有教材，讲课时讲你自己的，联系当前运动。讲共运史，讲巴黎公社，讲梯也尔还乡团，讲国际共运的投降派。……讲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也行，讲的是托、布，但实际骂的是右倾翻案风的后台。

（朱永嘉 1976 年 2 月 18 日在上海政治课函授教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中央发出了〔1976〕1 号文件。“四人帮”对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恨之入骨，张春桥写下了《有感》，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二月六日，张春桥让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布置“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

二月二十六日，江青对迟群、谢静宜下达黑旨意，要立即写一个所谓批最大的走资派的故事片。接着，确定由迟、谢在清华、北大抓剧本的炮制工作。

三月二日，迟、谢亲自召开清华、北大部分文艺创作人员会议，叫嚣“要抓一部电影，快点搞出来，……这是大局。”

三月十二日晚，在北大召开创作组会。迟群在会上别有用心地叫嚷：“剧本要回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银幕上要表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影片要创造条件让人们的眼睛一级一级往上盯，一直盯到中央”；“正面人物写工人新干部”，“反面人物可以写省委、中央部一级”、“写大走资派”。他指令创作组“五·一”拿出剧本，让摄制组保证“十·一”出片。

反击快摄制完成时，迟、谢又指令创作组“接着《反击》写下去，写与现在还在走的走资派斗争的剧本”。九月二十九日，×××说：“剧本就写按不按既定方针办的斗争。”

（北京大学揭发）

还是放寒假，你们把大字报选多印一些带到全国各地去，去点点火。……现在好比一张桌面上五根钉（四角和中间）都松了，我们先敲中间的一颗，即教育战线，抓住不放，狠狠的敲，敲得他们（注：指各级党委负责同志）头痛，然后再敲其他的钉。……春节后要大干。

（朱永嘉 1976 年春节前在复旦大学党委常委会上的讲话）

三月份去搞函授，正是外地变化时期，外地运动差上海三个月，现在可以去促他们，江西、安徽都动不起来，你们去煽风点火，把学校的材料带点去，多带点去，送给他们。

教材可以用现成的，但要讲自己的，要针对当前的斗争，要起到点火的目的，又不承担点火的责任，这才主动。

（朱永嘉 1976 年 2 月 18 日在上海政治课函授教师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去讲，是起放火作用，火是要放的，材料可以发学员，问到上海运动如何搞，你讲讲上海运动也可以，这样火放下去，你又很主动。

（朱永嘉 1976 年 2 月 18 日在上海政治课函授教师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把青年组织起来，给予他们学习，使他们旗帜鲜明，敢于斗争，能使他们去坚持斗争。给他们创造条件。组织他们学习，组织他们去斗争。叫他们（注：指各省领导同志）受不了。

（朱永嘉 1975 年 1 月 30 日在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慰问团负责函授工作的同志汇报工作时的讲话）

革命的任务很长，今后还会出现王少奇、李彪、徐小平。这类人物在各地还会碰到。最危险的是上面的走资派，越是中央的、各地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最危险的，同志们今后还会碰到，你们今后的争斗很艰巨，…我们就坚决地支持你们，反对修正主义，和你们站在一起。

（徐景贤 1976 年 5 月 4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座谈会上插话）

乱透了的地方，才能真正锻炼左派，左派才能掌权。

（迟群 1976 年 6 月 24 日在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上的讲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了清华刘冰的信以后，……迟群在两校“大批判组”拍着桌子狂叫：“他妈的！这下好办了”，“周荣鑫以为我看中了教育部长这个肥缺，我还嫌这个庙小呢！”

（摘自北京大学《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初编）》）

【批注】

“四人帮”直接操纵两校“大批判组”炮制大量反党文章，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恶毒地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突出宣扬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华国锋主席。“四人帮”严密控制清华、北大两校，在清华大学建立黑据点，插手各地运动，整中央和各地领导同志的黑材料。迟群说：清华“对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是学校地位，而且培养的人是造走资派反的。”这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帮”抓清华大学完全是为了在全国篡党夺权，就是妄图训练“四人帮”的走卒，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但这不过是痴心想。清华、北大的广大师生是决不会跟“四人帮”走的。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利用教育搞反革命也不甘落后，甚至连函授教育都不放过，利用函授教育到各省煽风点火。他们把教育战线比作“中间的一颗钉子”，要狠狠地敲，敲得各级党委负责同志“头痛”，“受不了”，以便他们层层夺权。这些都反复告诉我们：教育战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阵

地，是我们同“四人帮”斗争的重要阵地，要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定首先要把揭批“四人帮”这个中心任务抓好。

(三) 插手科教组和篡夺教育部的领导权，妄图 把黑手伸向全国

(1)

一九七三年九月八日至十一日，迟群在科教组召开教育战线第一次批孔会，在会上，迟群说什么“这次会议是部署性的会议，”“不光是教育战线的事，其他战线也要批，”“你们搞的材料……可以送给我们，中央还没有这个班子，先送我们，看在什么范围用。”并诬蔑不按他们“部署”的地方和单位，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会上，迟群恶毒攻击周总理。周总理在十大报告中强调各级领导要抓大事，迟群攻击说：“如不批孔，这件大事就没抓好。”迟群还别有用心地说：“不要去看那些修改再修改的文件”，“不如甩开”，猖狂对抗党的十大。会上迟群还大讲“走后门”的问题。

在一九七四年“一·二五”大会后，二月五日至八日，迟群又急急忙忙召开教育战线第二次批林批孔会，继续大搞“三箭齐发”，转移批林批孔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摘自教育部群众揭发材料)

【批注】

批林批孔，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耍尽了阴谋，极尽破坏之能事。一九七三年九月，党的十大刚刚闭幕，迟群就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一手策划召开了教育战线第一次批孔座谈会。会上，他们猖狂对抗党的十大，拒不贯彻十大精神，破坏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抢先布置批孔。他们抢“批孔”的旗帜，非难和攻击敬爱的周总理。他们只提批孔，不提批林，后来又搞“三箭齐发”，妄图转移批林批孔的大方向。这次会是“一·二五”大会的前奏。第二次批林批孔会，开始他们调门很高，由于他们在“一·二五”大会上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才不得不草草收场。

敬爱的周总理，在五四时期，就是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以后，他直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以及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毛主席作出批林批孔的决策后，周总理又亲自作了部署和安排。“四人帮”抢“批孔”旗帜，攻击爱的周总理，攻击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正好暴露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四人帮”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批林批孔的“英雄”，其实，他们在批林批孔中包藏祸心，另搞一套。他们批林批孔是假，篡党夺权才是真的。他们同林彪一样，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篡权复辟。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正是他们自己。

(2)

要有一点精神，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干什么？就是破“因守旧”。……破“因循守旧”是个大题目，要从政治思想上写。矛头所指是一小提，……把列宁的“其重无比的大山”的语录加进去。要讲因循守旧的危害性，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迟群 1974 年 12 月 10 日对《教育革命通讯》十二期《破“因循守旧”》一文的意见）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开朝农现场会时，反党分子迟群与毛远新一唱一和，在破“因循守旧”的幌子下，借华北农大（原北京农大）从延安搬到涿县要清算！”

一事，大作文章，说什么“回来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不管谁批的，都要清算！”把罪恶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

（摘自教育部《大字报选编》）

【批注】

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江青点题要批“因循守旧”，矛头是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为“四人帮”密谋“组阁”制造反革命舆论的。迟群不仅布置两校“大批判组”写这篇黑文，而且指令《教育革命通讯》等刊物都要写。迟群特地要把列宁的“其重无比的大山”的语录加进文章中去，其罪恶目的就是以此影射周总理。“四人帮”把周总理看作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此千方百计要把这座“大山”搬掉。他们用“因循守旧”的罪名来攻击周总理，真是可恶之极。历史证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而“四人帮”才是因循守旧派、复辟派，是“一小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朝农的一次座谈会上，毛远新、迟群在破“因循守旧”的幌子下，利用华北农大从延安搬到涿县的问题大作文章，气势汹汹地说什么“回来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不管谁批的，都要清算！”这完全是攻击、陷害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事实上，华北农大的搬迁问题，迟群当时是赞成的，科教组给国务院的《关于北京农业大学搬迁和改为华北农大的请示》是迟群亲自签发的，迟在报告中还亲笔加了搬迁涿县的理由和好处。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四日，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对国务院科教组的这个请示报告

作了批示。先念副总理批示：“拟同意（再不要三心二意了）…，周总理最后批示：“同意”。这些情况迟群是全然了解的。迟群为了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竟然捏造事实，倒打一耙，如此恶毒攻击周总理，真是卑鄙之极。这说明，这些家伙完全是一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反革命的实用主义者。

(3)

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阶级斗争是不会熄灭的。现在人民群众里边，包括教育方面，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敌人也是有活动，这要做些调查……要警惕，要研究这些情况。

你们不要只看教育部，要和全国联系在一起看，要从全国的大、中小学的情况，从教育战线看全国，把眼光看远一点，更不要只看到教育部机关。教育战线历来是晴雨表，是和整个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相联的。那里有那么多青年学生，他们干革命是先锋，闹事开始也是他们。你们要从全国斗争来研究，抓住大、中、小学带方向性的根本问题，既看到教育革命的本身，也从全国看到反映了什么问题，是一种什么信号？

（张春桥 1976 年 9 月 29 日同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和中国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教育代表团的讲话）

反党分子迟群指使他在教育部的亲信四处活动，搜集、整理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黑材料。他利用教育部插手地方运动。去年八月，迟群就指示他在教育部的亲信给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打电话，了解各地对三个小册子的反映（《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为“四人帮”收集情报。他还秘密派人搜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运动情况和领导的态度，整理黑材料送“四人帮”。

（摘自教育部群众揭发材料）

【批注】

张春桥的“九·二九”讲话，是“四人帮”灭亡前妄图通过教育部，把黑手伸向全国，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一个铁证。就在“九·二九”的前一天，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派肖木送口信给他在上海市的党、亲信，要他们“经常分析阶级斗争形势，准备真正经受严重考验并示意“上海有大考验，要打打仗”。这是给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动员令。九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就对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发表了这个黑讲话，要驱赶教育部的绝大多数干部到各省去为他们篡党夺权搜集情报，窥测方向，以便他们寻求适当的时机求一逞。他们在教育部的亲信，把驱赶教育部干部到各省去的计划和安排都搞好了，由于“四人帮”垮台才未完成。

（四）大抓所谓“复辟”事件，大树所谓“反潮流”的典型，妄图大乱无产阶级天下

一九七三年七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发生了一个女学生因被教师讽刺、打击而含愤自杀的事件。河南省各级党委已作了认真处理。十月，河南省教育局发了简报。此事反映到科教组后，有关业务组写了简报上报迟群，建议征得河南同意后转发各省，竟被他压了两个月之久，直到一九七四年一月初，在经办同志催问下，才批了“（科教组）是否发简报还要斟酌”的话，可见他并不重视这个问题。过了几天，江青突然派迟群、谢静宜去河南调查。他们只在公社呆了一天，就抛出了一个调查报告，一方面无耻地吹捧江青，说什么江青“抓的是一个教育问题，但他涉及到各条战线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即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如何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问题”，说什么江青“做出了抓大事的榜样”，“对于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人……是一次很生动的教育”；另一方面，别有用心地说什么要“狠

狠回击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反攻倒算”。在“一·二五”大会上，“四人帮”就把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抛了出来，大造所谓“反复辟”的舆论，妄图影射攻击周总理，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摘自教育部群众揭发材料）

建议立即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研究，严肃处理。北京市已有几个学校实行法西斯主义，让坏人专了学生的政。打、骂、死、活听之。是在社会主义中国？还是在国民党的台湾？建议北京市委抓紧批林批孔这个纲，抓住典型。这是坏典型，是要夺权改革的问题。师道尊严，也要彻底批判，这种残害青年的败类，应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江青 1974 年 3 月对北京市永乐中学教师×××来信的“批示”）

江青大肆宣扬：《答卷》作者（注：指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摘自 1976 年 11 月 30 日《人民日报》《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

姚文元：“向这个‘交白卷’的先进青年学习”。

（摘自 1976 年 11 月 28 日《辽宁日报》）

在一次会上，我支持了张铁生。我当时不知道是远新他们抓的他带了四十个人去大寨学习，路过北京，要到清华看大字报，北京市不安排。他找了谢静宜、迟群同志，他们就安排了。他到了太原，请他讲话，他点了火，他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

（江青 1976 年 2 月在打招呼会议四川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我是一个小石子，被……推向政治舞台。……我现在愿做一把钢刀，直刺修正主义路线，直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张铁生 1976 年 2 月 3 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我们必须把走资派撤掉，只有这样才能清除垃圾，吸取新鲜血液，这是无产阶级铁的手腕。

（张铁生 1976 年 2 月 3 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张铁生同志那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再有××，…那也是一敢于反潮流的，……假如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现这样一部分问题，揭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能不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向这种顽固派作反击呢？没有这样一支力量，岂不就是复辟了吗？没有这样一场斗争，岂不是资产阶级又专了无产阶级政了吗？

（迟群 1974 年 1 月 7 日在九省、市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三年九月，徐景贤看到文教组送的上海师大一个工农兵学员×××的《谈话记录》喜出望外，认为是“抓到了问题”，不与师大党委商量，便写了批语：“读了此件，很受教育，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作斗争是长期艰巨的任务，建议文教组将此件加按语印发各高校，请革命师生员工讨论。”

×××的谈话，原是由于她对个人的毕业鉴定有些意见，如谈话一开始就说：“这些日子想了很多，做鉴定以来，好多夜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思想斗争很激烈。”被徐景贤改为：“最近看了张铁生的一封信，很受启发和鼓舞，我想了很多。”《谈话记录》整理稿与见报稿比较，被删掉三分之一以上，增加了四分之一左右。这场讨论在报上持续了三个多月，共发表三十组一百七十篇文章。

徐景贤借批“智育第一”，抛出这份《谈话记录》，是有其反革命的用心的。

一九七二年前后，周总理对教育革命作了要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等重要指示，在华国锋同志关怀下，诞生了歌颂教育革命的好戏——《园丁之歌》。对此，“四人帮”恨之入骨，猖狂反对，徐景贤叫嚷：“我们现在给一些叫基础的人搞昏了，”“周培源的文章是复辟回潮的信号，”并对《谈话记录》的讨论十分明白地

说：“这次就是借贵方（注：上海师大）一块宝地，一个同志的谈话，把资产阶级势力再扫一扫。”

（根据上海师大教育革命组揭发材料摘编）

徐景贤这样肆意炮制《谈话记录》，是“四人帮”直接授意的。他曾直言不讳地说过：“最近向中央领导（注：指“四人帮”）作了汇报，春桥、文元很支持。”并说：“这样修改，实质问题有了，有些删掉，有些改正是领导同志（注：指“四人帮”）指出的。”

（摘自上海师大工宣队团部、中文系联合调查组《一石激起什么浪》）

去年六月四日，江青在看了某报报道河南省民权县黄庄红小兵搞生物防治的消息以后，写下一个黑批示：“组织一个过硬的科教片小组，用好的胶片，拍一部科教片，这是一件大事。”

江青、姚文元借这件事，大刮反经验主义的妖风，大肆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突出儿童团，总比突出老头子们强”，“什么都是大人教给的，还有什么意义！”妄图以此来否定革命老一代，并欺世盗名，突出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

（根据 1977 年 1 月 18 日《解放军报》《“四人帮”炮制〈科技花〉的险恶用心》一文摘编）

也就是说这样一些人（注：指教师队伍）可以这么估计他们，不论是哪个社会，不论是哪个国家，不论是哪个阶级掌权，他们都可以凭着那点知识、本钱混饭吃。恐怕苏修打到中国来时，他们还可能打着白旗上街去欢迎，这可没准。假如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话，恐怕他比现在还高兴，比现在搞教育革命还适应，比现在还吃香、卖力、挣钱还得多，这个恐怕是事实吧！我那么想：到那个时候，如果真的变了天了，他们就不可能再喊毛主席万岁了，也不敢再喊共产党万岁了。他们要

喊谁万岁？咱就不知道了，恐怕谁统治中国他就喊谁万岁，这有什么办法？世界观决定的。

（张铁生 1976 年 1 月 28 日在北大的讲话）

我们必须大胆地把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从我们的教育领导岗位上赶快撤销，……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党内堆集的垃圾清除出去，新鲜血液才能充实进来。如果我们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各个单位都能照这样做，我们看形势一定会大好的。这样做也不是我们独裁，这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

（张铁生 1976 年 2 月 10 日在太原市湖滨会堂的讲话）

【批注】

“四人帮”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从篡党夺权的需要出发，乱批文件，大抓所谓“复辟”事件，蓄意在教育战线制造事端，妄图把无产阶级的天下搞乱，“乱中夺权”。他们抓住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一个学生自杀事件，大肆兴师问罪，借此大造所谓“反复辟”的舆论，妄图整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整广大革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树他们自己。迟群、谢静宜去河南“调查”时，公开叫嚷批林彪在河南的死党“不适当”，煽动要批“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究竟这是批林批孔还是同林彪、孔丘穿一条裤子，不是清清楚楚的吗？江青还抓住北京市永乐中学一个教师反映学校问题的一封信，根本不进行任何调查，就借题发挥，乱作批示，恶毒诬蔑我们的学校是“在国民党的台湾”，并对学校领导班子妄加罪名，猖狂地叫嚷要实行“夺权改革”。这不但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是对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无耻诽谤。这两个事件在教育战线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和严重后果。

“四人帮”一手大抓所谓“复辟”事件，一手大树所谓“反潮流”的“英雄”。他们大树的那个“反潮流”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改名换姓冒充贫农。他极端仇恨毛主席，仇恨周总理，恶毒咒骂英明领袖华主席。他疯狂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他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四处点火，八方串连，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完全是一个林彪反党集团“小舰队”式的人物。

“四人帮”把这样的反革命小丑，作为他们的“队伍”，“力量”，把他吹捧为“敢于反潮流的英雄”，“真正的又红又专”，充分暴露他们依靠这样的反革命分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用心。“四人帮”及其黑干将所说的什么向“顽固派作反击”，什么“没有这样一支力量，岂不是复辟了吗？”完全是一派颠倒敌我关系的反革命呓语。

二、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推行反革命的

修正主义路线

按：“四人帮”自封为“马列主义理论家”，“正确路线的代表”，“教育革命的旗手”，到处招摇撞骗。“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曾狂妄地说：为什么“要找我的人很多，因为我是一面旗帜”，真是不知人问有羞耻两字。

革命导师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四人帮”蓄意颠倒社会主义时期的敌我关系，从根本上篡改党的基本路线，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他们是一伙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几年来，他们在教育战线打着“阶级斗争”“反走资派”，“反潮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旗号，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必须彻底剥开这些画皮，把它的极右实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进一步认清他们是一伙极右派、彻头彻尾的走资派、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

（一）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其实是宣扬 “阶级斗争熄灭论”，向无产阶级进攻

（谈到大学生中一月土，二月洋，三月不要村姑娘）我是把你往阶级斗争上拉，你老是谈具体问题。……

（谈到争夺青少年，思想教育问题，黄色书《少女之心》不但城市有，农村也有）争夺青少年，出现这样的问题，是现在多，还是过去多？是多了，还是少了？黄色书是多了，还是少了？有些是抄家抄出来的。解放初马路上有的是，上海就是这样的。在资产阶级家里是公开的。

（张春桥 1975 年 11 月 8 日的一次谈话）

（在座谈某些学生砸玻璃，一个教师说到青年缺乏理想时）谁说我们青年没有理想，我们青年人的理想早已树立了，就是解放全人类。

（谢静宜 1974 年 11 月 30 日在北京市某中学的一次谈话）

（汇报到有些学生胸无大志，缺乏共产主义理想，需要加强教育时）现在学生那有坏的！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生长的。阶级敌人才这样说我们青年一代，你们怎么也这样说！

（谢静宜 1974 年对北京市某中学负责人的谈话）

这是多么可爱的小将啊！打碎几块玻璃有什么了不起，有人想借这个否定批林批孔。

（谢静宜 1974 年在北京市某中学的谈话）

张春桥在一九七二年的一次座谈会和团代会筹备会上公开讲：“那些小流氓引导好，打起仗来一定是不怕死的，是很勇敢的，有的可成为英雄。”明目张胆地为小流氓辩护。七五年夏，祝家耀带着公安部的一个调查组，一次到江南造船厂看万吨轮下水，他碰到我，并莫名其妙地突然问我：“春桥要你们（指团干部）交几个流氓阿飞朋友，你们交了没有？”我说没有听说过，团干部怎么与流氓阿飞交朋友呢！你们公安部门才与他们打交道呐。祝说：“不，这是春桥讲的。”当时在场的有公安部的好几个人。

（共青团上海市委×××揭发）

总的来看，历史上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

（江青 1974 年 6 月 19 日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批注】

“四人帮”高喊阶级斗争，把自己装扮成“左派”，其实他们和刘少奇一样，也是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在对青少年政治思想教育问题上，他们的马脚完全暴露出来了。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的激烈斗争说成是“具体问题”，“现在的学生那有坏的”，这不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又是什么？当然，他们要熄灭的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他们是刻也不熄灭的。他们要无产阶级放弃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的斗争，妄图把青少年腐蚀、拉拢过去，跟着他们去干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江青鼓吹法家“对群众是爱护的”，根本抹煞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界线。他们把阶级斗争的历史篡改为儒法斗争的历史。这也进步说明，“四人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贩卖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的。

（二）打着“反走资派”的旗号，其实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

你们还年轻，我们也不老，咱们准备同走资派斗争一辈子。

（迟群 1976 年 10 月 6 日在清华大学团委和上管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毛远新背着省委，在省直机关，组织了一个由他领导的“学习小组”。学习小组的成员都是省直组委局的年青领导干部。……他还跟他们讲：“以后就靠我们这些人了”，“老的都是孔老二”。

摘自《“四人帮”死党毛远新在辽宁的主要罪行》)

一九七四年春，毛远新在省工农干部学习班上，公开提出选拔青年干部的三条标准：一要“有路线斗争觉悟”；二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斗”；三要“懂政策”、“善斗”。……他在省委常委会研究干部时，还经常说：“选拔干部就要看九、十次路线斗争中冲杀出来的，敢造反的，有棱角的”，根本不提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摘自《“四人帮”死党毛远新在辽宁的主要罪行》）

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能反潮流，和走资派斗，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打 99 分，……要把十分之九的精力放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上。

（迟群 1976 年 8 月 25 日在清华对校机关工作人员的谈话）

还有一个所谓经验问题。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特别强调经验。但是，什么是经验，要作阶级分析。他们的经验就是复辟倒退的经验。退一步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对现在没有什么现实（意义），还给自己贴一点金。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一套不行了！我们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尤其是造走资派反的经验，这是他们最害怕的。

（迟群 1976 年 4 月 7 日在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学习中央两个决议上的讲话）

老干部讲经验，经验要进行阶级分析。

他们可以大讲打倒日本、蒋家王朝，长征，把他们打扮成英雄，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变成走资派，这是一条规律。

（迟群讲话，摘自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

四、五十岁以上的干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是民主派。

（张铁生 1974 年在辽宁阜新县国强公社的一次讲话）

邓记谣言公司，邓小平就是总经理。一些同志受毒害，总根子是邓，是邓记谣言公司。谁是副经理、董事长？不知道，随着联系实际，总会慢慢搞清楚的。

（迟群 1976 年 6 月 22 日在教育部全体人员大会上的讲话）

这就要求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眼睛要向上看，重点盯住当权派。…首先看第一把手。要盯住支部、总支、分党委、校党委，一层盯层。我们学校就要盯着北京市委，要看到教育部。教育部要看到国务院、中央。没这一手，怎么对付走资派？！

（迟群 1976 年 6 月 22 日在教育部全体人员大会上的讲话）

瞪着眼睛盯着中央出不出修正主义，……我们上管改的意义就在这里。

（张铁生 1976 年 2 月 3 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左派是不是组织起来把右派打倒了？还没有。现在，是要用毛主席指示武装、组织队伍，正在学习，正在组织队伍。不改，当然要打倒。

（迟群 1976 年 6 月 22 日在教育部全体人员大会上的讲话）

如果风云变幻的话，咱们这个省有可能成为根据地，或者是大本营，或者是井冈山。现在咱们学习政治，学习经济，学习技术，也应该学点军事。

（张铁生 1976 年 8 月 29 日在铁岭农学院应届毕业生大会上的讲话）

【批注】

“四人帮”高喊要同走资派作斗争，实际上他们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把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篡改为青年干部同老干部的矛盾，把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篡改为经验主义，把反革命的矛头指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他们公然攻击毛主席领导我党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历史和斗争经验是“复辟倒退”和“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公然攻击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变成走资派”，公然煽动学校和教育部门“一层盯一层”，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公然叫嚣要“组织队伍”把中央和地方的革命领导干部当作“右派”打倒。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是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是极右派，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派。他们所鼓吹的“我们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是“四人帮”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经验，而决不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经验。他们准备“如果风云变幻的话”，就搞反革命割据。“四人帮”打着“反走资派”的旗号，招摇撞骗，妄图把青年学生绑在他们篡党夺权的战车上，这是痴心妄想。历史已经把“四人帮”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三）打着“反潮流”的旗号，其实是反马列主义的革命潮流

王洪文鼓吹张铁生“反潮流”时说：“要锻炼一支反潮流的干部队伍”。

（摘自1976年12月2日《人民日报》《从一个凶恶打手看“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

青年同志就是头上要长角，身上长刺，不管是谁，凡是错误的都要敢顶

（毛远新 1974 年 1 月在辽宁团省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皮”也要一分为二，一点不“皮”的学生倒也不一定有很大出息，有点“皮”的学生，只要引导到正确轨道上来，就敢于反潮流，要鼓励学生有“闯”劲，敢于提意见，或敢于向老师错误的东西顶撞，或者不一定是教师错，但学生认为错的，老师要分析。

（徐景贤 1975 年 11 月 22 日在上海市第二中学的讲话）

评两句：你们对当前斗争缺乏敏感，也缺角。对当前意识形态对宣传组批评两句：你们对当前斗争缺乏敏感，也缺角。对当前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主动，比较被动。你们宣传组过去不是有个总结“应作风云雷雨的嚼兵”吗？！哨兵都不敏感，敌人都进大营里了

（毛远新 1974 年 1 月 18 日在关于批孔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这个报告我不感兴趣，没个棱角，不解决问题。这次大会要突出讲张铁生反潮流精神，讲话要一针见血，能刺痛一些人，让大家坐不住，浑身冒汗。

（谢静宜 1973 年 8 月关于北京市教育局起草的北京市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报告稿的谈话）

五年级小学生敢于反潮流不简单，……

你反映的问题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

（谢静宜 1973 年 12 月 5 日接见××时的讲话）

你反潮流，大方向是正确的，你反映的问题在全国有代表性。

（迟群 1973 年 12 月 5 日接见××时的讲话）

几封信应大作文章，抓的不够狠。××的信挑起一场激烈的论，在中小学震动很大。对张铁生的信抓得不够，你们应当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做的不够。

（毛远新 1974 年 1 月 18 日在关于批孔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学，甚至小学的批林批孔都应抓紧些。要抓典型，以点带面。如不及时抓紧，对青少年、儿童不利。《三字经》之类的东西，就为针对少年、儿童编的。我们对这个问题不重视，不能使一个人从儿童、少年就粗知一点马克思主义，敢于批孔老二，值得深思。

（江青 1974 年 7 月 12 日对北京市某中学教师×××一信的“批示”）

中、小学历史、语文课本，应该检查一下，有些要改写。有些教材没有体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精神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论语》可编入大学教材，《神童诗》可编入中学课本，作为反面教材，从小培养敢于批孔老二的战斗精神。反动统治阶级搞《三字经》之类宣扬孔孟之道的教材多种，我们要有破有立，要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教材远远超过它。

（江青 1974 年国庆期间对中小学教材改革的“意见”）

党内也是要分化的，随着阶级斗争发展，总有一些人被淘汰的，名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孔老二。所以反潮流，很大一部分是对党内的，对着当权的了。

（毛远新 1976 年 4 月在辽宁省工农兵干部学习班的讲话）

当今有没有孔子？他上台，我们就成了少正卯了。

（毛远新 1974 年与×××的一次谈话）

同学们，你们不要害怕，如果谁要再打击报复的，绝没有好下场！要是决的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了不起象当年的少正卯。少正卯死了两千多了，今天照样给他翻了案。……不要替孔老二说话，不怕刁难，不怕打击报复。

（毛远新 1974 年 2 月 19 日在鞍山四十三中座谈会上的讲话）

你们回去要当先锋，当闯将，带头批林批孔，我们希望放虎归山，但不是咬老者百姓，而是同修正主义斗。

（毛远新 1976 年 4 月在辽宁省工农兵干部学习班的讲话）

【批注】

“四人帮”高喊“反潮流”，其实他们反的是马列主义的革命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这是指反对错误潮流而言的，每一个革命者都应是反对错误潮流的战士。“四人帮”抽掉“反潮流”的阶级内容，“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为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服务，这正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所惯用的卑劣伎俩。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四人帮”逆历史潮流而动妄想阻挡这个潮流，只能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而他们所掀起的那股反革命逆流，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进行了种种抵制和斗争，这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四人帮”拉“反潮流”的大旗作虎皮，包住自己，吓唬别人，只能更加暴露他们的反革命丑恶嘴脸。江青提出要使儿童、少年“敢于批孔老二”，从表面看似乎是要反几千年来儒家思想的潮流，实际上是为“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要揪所谓“现代的大儒”服务的。我们决不可为其假象所迷惑。

（四）打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其实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读书无用论并不可怕。过了一年全部是读书有用论，我就不相信有人真不想当干部，资产阶级法权嘛！

（张春桥 1970 年的一次讲话）

大学出来总是要进领导机关，这就是大学跟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大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不管怎么样，大学毕业回工厂，也会成为工厂的骨干，有的当主任、书记。甚至到省、中央机关。

（张春桥 1971 年 7 月 13 日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毛远新不同省委领导商量，更未经省委集体讨论，个人擅自决定，在全省实行“农村公办教师工资改工分”，在教师中引起很大波动，结果不得不在一九七二年又重新改了过来。

（摘自《“四人帮”死党毛远新在辽宁的主要罪行》）

享受星期天我看多一半是资产阶级法权，……象咱这单位（注：指农学院）是养爷的地方，机关的人休息什么星期天，纯纯粹粹是一种变相剥削，我看不是变相剥削，是直接剥削。

（张铁生 1976 年 8 月 29 日在铁岭农学院应届毕业生大会上的讲话）

在我们党内组织路线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很厉害的，在政治上、组织上的一些民主派还存在，这些民主派官越大越挡道，必须来一个大的风暴。

（张铁生 1976 年 6 月 24 日晚在铁岭农学院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批注】

“四人帮”高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其实是在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所要限制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要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供他们享用，任意挥霍；对于他们自己，不但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而且要追求封建主的特权。在教育上，他们口口声声讲什么要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实际上是反对为革命学文化，这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子女说的；而对他们自己的子女，他们奉行的仍然是“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那套黑货。什么“大学出来总是要进领导机关”“大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呀，什么“我就不相信有人真不想当干部”呀，恰恰是他们自己修正主义灵魂的大暴露。他们成天攻击别人违反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其实，从骨子里反对毛主席《七指示》的正是他们自己。

特别要指出的是，“四人帮”还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下偷运反革命私货。他们妄图借此攻击一大批老干部，丑化我们的党，搞乱人们的思想，挑动革命队伍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是为了要篡党夺权。

三、篡改毛主席教育革命理论、方针和政 策，大搞形而上学，破坏教育革命

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上居主导地位。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的领导下，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近几年来，“四人帮”反党集团打着“教育革命”的旗号，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大搞形而上学，千方百计地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方针和政策，反对党对教育的领导，妄图把教育革命搞乱、搞垮，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对“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所造成的恶果和恶劣影响，绝不能低估。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滔天罪行，分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继续开展教育革命。

（一）修正马列主义的教育革命理论

（1）

在批邓中要认真研究一下教育革命问题。……我们的话说得更明白一点，宁肯要列宁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宁肯少学一些，也不要红色工程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迟群、谢静宜 1976 年 3 月在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

宁可少读两本书，也别叫资产阶级熏染下一代。

（毛远新 1976 年 6 月的一次讲话）

打了 100 分，搞修正主义，这又有什么用呢？打了 0 分，但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很清楚。哪个有用呢？

（迟群 1973 年 8 月 4 日在招生会议上的讲话）

对张铁生那封信，都是这样，骂呀！说二十年后卫星上不了天，张铁生负责有人给我写信说你不要以为拣了一块黄金，是拣了一块铜子。我说什么黄金铜碴子，是拣了一块石块，是有棱有角的石头，打你们这些阻碍教育革命的人。

（毛远新 1974 年 12 月 23 日在朝农经验交流现场会上的讲话）

【批注】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究竟是革什么？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四人帮”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倒敌我，并用领导和被领导有文化和无文化、教师和学生的矛盾等等，来掩盖和代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这个主要矛盾，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修正了马列主义的教育革命理论。他们特别集中在有文化和无文化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张春桥、毛远新和迟群都讲得很明白，就是要革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学文化的命。什么“宁肯要列宁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宁肯少学一些，也不要红色工程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什么“宁可少读两本书，也别叫资产阶级熏染下一代”，话虽然不那么直截了当，但其意已在言中。过去是资产阶级掌握文化，现在劳动人民学文化也会变成资产阶级，因此要革学文化的命，这就是他们的荒唐逻辑。“四人帮”在教育革命中造过许多舆论，什么“卫星上天，红旗必然落地”，“知识到手，人就会被夺走”，“学了专业，就会忘了专

政”，等等，统统都是把革命同学文化对立起来。他们别有用心地把在修正主义路线下出现过的一些值得警惕的情况当作普遍规律，来修正马列主义的教有革命理论，歪曲列宁关于“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思想，借以破坏教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他们的这个修正主义骗局，必须彻底戳穿。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在教育战线上革资产阶级的命，是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说到底是要解决教育阵地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这个主要矛盾，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四人帮”及其在教育战线上的黑干将极力抹煞这个主要矛盾，臆造了一个100分与0分的矛盾。他们硬把“打了一百分”同“搞修正主义”联在一起，把“打了0分”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很清楚”联在一起，借以鼓吹100分是修正主义，0分是马克思主义。于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就被偷换为0分与100分的矛盾。张铁生这个“白卷”英雄的典型，原来正是这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的产物。毛远新要拣起张铁生“这块石头”打所谓“阻碍教有革命的人”，历史已经证明：阻碍和破坏教育革命的人正是他们自己。

(2)

我们和他们（注：指美帝、苏修）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就在两头上。一个是有社会主义觉悟，一个是劳动者，就从两头上体现我们的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毛远新1974年四月11日在辽宁省教育战线工宣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不要两头，光讲文化，请问和苏联、美国有什么不同，如果就是学文化，恐怕人家学的比我们还要好一点，因为人家科学比我们发达。所以最主要的区别是两头。我们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苏修是培养有文化的特权阶层，美国是培养有文化的垄断资本家的奴仆。如果我们也只要文化，不要两头，那和苏修、美国有什么区别呢？

（毛远新 1973 年 11 月 24 日接见抚顺化工学院上访的工农兵学员时的讲话）

【批注】“四人帮”的死党毛远新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教育理论问题，即无产阶级教育同资产阶级教育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毛远新玩弄形而上学手法，别有用心地制造思想混乱。第一，割裂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把它肢解为三截，说“两头”和苏修、美帝有区别，“中间”没有“什么不同”。这实际上就是攻击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方针是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的混合物。他们反对全面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其中的一个秘密原来就在这里。第二，说苏修、美帝的教育是“光讲文化”、“只要文化”，这正是继承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家的衣钵，卑劣无耻地替资产阶级教育进行稀护。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国家的学校都是把本阶级的政治放在第位。第三，对文化不进行阶级分析，把文化看成是“超阶级”的，根本抹煞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区别，否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思想。毛远新鼓吹“学文化，恐怕人家学的比我们还要好一点”，完全是一副奴才相。第四，诬蔑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唯心主义地捏造了个“不要两头，光讲文化”的罪名，硬扣在广大教育

工作者头上，为他们肆意挥舞“智育第一”的大棒破坏教育革命制造舆论。

（二）篡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教育方针

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张春桥 1975 年 11 月 8 日的一次谈话）

提倡“三好”是对的，毛主席提倡的，是努力的方向。但学生中没有一个是“三好”的，一个青年总有缺点，如身体好，（对一个戴近视眼镜的同志）你的眼睛就不行，身体真好？学习好，学习中总有缺点，好了没有缺点，坏的没有好的？这是形而上学，还是要一分为二。

（张春桥 1972 年 11 月 5 日在共青团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筹备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学校就是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

（迟群 1976 年 10 月 6 日与清华大学×××、×××的谈话）

农学院毕业学生，还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这是第一条。

（毛远新 1974 年 12 月 23 日在朝农现场会上的讲话）

反党分子迟群公然叫嚷：“批邓是纲，其余都是目，要把 90%的时间用在批邓上”。

（北京大学教有革命部揭发）

张春桥说：“要把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干部送到中央，闹得它个天翻地覆。”

（摘自 1976 年 11 月 19 日《解放日报》《彻底批判“四人帮”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

在如今教育革命的高潮中，在我们的宣传机器里，长时间也没有听到共大的消息了。江西共大哪里去了呢？真担心。她在崇高的荣誉面前随波逐流，顺从了刘少奇修正主义统治的十七年，唯恐成了主席“七·三〇”光辉指示的灯下黑，如果那样的话，恐怕省委的问题要严重，共大前党委更应该深刻反省。

（张铁生 1975 年 3 月 8 日的一封信）

当讲到江西共大与函授时，朱永嘉说：“函授可以放在共大办，办个几期，他就懂得他们那一套不行了！”

（朱永嘉 1975 年 1 月 30 日在上海市革委文教组召开慰问团负责函授同志汇报工作时的讲话）

【批注】

毛主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求青少年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四人帮”却篡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教育方针，把“有文化”同“有社会主义觉悟”、“劳动者”对立起来，把“三好”互相对立起来。他们一方面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口号下，妄图使广大劳动人民子弟处于供他们奴役和剥削的驯服奴仆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学校就是培养同走贡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口号下，要培养一批象张铁生那样“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跟着他们跑的反革命打手，把无产阶级的天下“闹得它个天翻地

覆”，他们要使教育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使教育永远同生产劳动相对立。他们还诬蔑江西共大，攻击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

“四人帮”自己大搞形而上学，却狗胆包天地攻击毛主席要求青少年做到三好是“形而上学”。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极右派真面目。在政治上，他们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理论上，他们是用相对论的诡辩术攻击辩证唯物主义。

（三）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资产阶级思想 毒害青少年

谈到流氓阿飞打架时）我想这样的青年可能有长处，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可能救火很勇敢，当解放军上前线，受重伤不下火线。

（张春桥 1972 年 11 月 20 日在共青团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筹备会上的讲话）

孩子不犯错误不可能，他这个时候正是该犯错误的时候，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就不要关，要使他们生动活泼，他以后可以改嘛！

（张春桥 1969 年 6 月 6 日在《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编写人员座谈会讲话）

你们那里的政治工作，首先是成年人的政治工作，孩子再过几年。

（张春桥 1970 年 5 月 5 日对五七京训班同志的讲话）

……当前社会上黄色书刊流传很多，你把它全部收起来，烧掉，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把它锁起来，也不是个办法，还是可以拿走嘛！

……对于黄色书刊，有些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看，只好偷偷地看。你要禁也禁不了，与其偷着看，还不如拿出来大家一起看，看了就组织批判，进行消毒。

（张春桥 1970 年在上海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还有看书，坏书到处流传，就不准看禁书，不是去引导青年看好书，我们要引导青年看好书，但好书毕竟数量少，有些不好的书，越不给看，背后越要看，与其这样，还是大家一起看，看后开批判会。

（张春桥 1970 年 11 月 20 日在共青团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筹备会上的讲话）

江青还向革命文艺工作者推销搞文艺创作的“参考书”，如要我们向宣扬金钱万能、因果报应的《基度山恩仇记》及宣扬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飘等西方资产阶级小说“学习”、“借鉴”……

（摘自 1976 年 11 月 23 日《文汇报》《一个崇拜封资修文艺的奴才》）

不能讲抽烟就不行了，我也抽烟，讨论抽烟好不好，一百年也讨论不出结论

（张春桥 1972 年 10 月 16 日在上海一次团的工作座谈会上对青年的谈话）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八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窜到骊山中学，在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公然与一个流飞学生热烈握手，并且大肆吹捧，怂恿他说：“×××，你要变成无产阶级压在资产阶级头上的、压在修正主义头上的山嘛！”充分暴露了一副教唆犯的丑恶嘴脸。

（上海市教育局中小学组揭发）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公然鼓吹“流氓有用论”。张春桥说：流氓阿飞“有长处”，“很勇敢”，“打起仗来有用”。朱永嘉这个文赤裸裸地讲：“蒋介石起家是靠流氓无产阶级，而今天这类流氓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一部分基

础。”徐景贤更是身体力行，几次到学校找流氓阿飞学生握手、交朋友，说有了事可以找他。

（上海市教育局揭发）

“四人帮”是最大的政治教唆犯，是坑害青少年的罪魁祸首。他们散布的种种谬论严重地毒害和影响了一部分青少年。可是徐景贤却无耻地说什么“美国是学生上课把枪放在桌上威胁教师，苏联是满街妓女，我们的青年跟美国、苏联比起来好多了。”

（上海市教育局揭发）

什么叫教唆犯，你老师就是教唆犯。

（毛远新 1974 年 2 月 19 日在鞍山四十三中座谈会上的讲话）

【批注】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再教导我们：“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

“四人帮”竭力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为了诱使青少年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一方面反对学校抓政治思想工作，阻挠青少年掌握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一方面拚命向青少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他们提倡青少年看坏书，把流氓打架斗殴美化为“勇敢”，教唆青少年走向犯罪，走向反革命的邪路。他们鼓吹的青少年“自然成长论”，就是成长到资产阶级那里去。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四人帮”在青少年教育上推行的是一条极右路线。他们把教师教育学生说成是“教唆”，骂教师是“教唆犯”，其实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

“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破坏学校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破坏对青少年的教育。对这一点，必须有足够的认识。系统的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教育被他们取消了，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被他们弄得敌我颠倒、是非混淆，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和革命纪律教育被他们破坏殆尽，革命的传统教育被他们攻击为“昔民主派评功摆好”，要一笔勾销。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艰苦奋斗的精神，为革命而学习的志向，这些他们都不讲，甚至乱扣“修正主义”、“个人主义”的大帽子；而把小撮反革命、流氓、阿飞、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捧作“反潮流”的英雄，要广大青少年学他们的样子，跟着他们走。“掌握思想是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粉碎了“四人帮”，在教育革命中我们一定要将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抓好。

（四）反对为革命学文化

（1）

即使搞十年运动，学生都成了文盲，但打倒了刘少奇、林彪，就是最大的胜利。

（张春桥 1972 年 10 月 3 日的一次谈话）

毛远新有一次在鞍山对学生说：“没有文化照样革命，”“学习不好问题不大。”

（1977 年 3 月教育部召开教育事业计划座谈会上辽宁省教育局的同志揭发）

不要钻这个（注：指业务技术），这个没啥用，要突出政治，有了政治，业务就自然而然的上去了。

（张铁生 1974 年在辽宁阜新县国强公社兽医站的一次讲话）

一九七一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我国外交战线上斗争迅速发展的形势指示要加紧培养外语人材，要从小学开始学外语。……

但是，我们遵循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开展教育革命，却恼怒了“四人帮”。他们胡说我们这是在“搞外语特殊”，“业务挂帅”，并攻击说“从小学外语是搞修正主义。”

（摘自 1976 年 12 月 12 日《光明日报》北京外国语学院大批判组文章）

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这句话问题就更大了，简直是反攻倒算！过去老干部大多数没有文化，照样能够参加革命。

（江青 1973 年 7 月 28 日在审查《园丁之歌》时的讲话）

影片（注：指《园丁之歌》）歌颂的人物也是错误的。除男教员以外，女教员作为大树对象，她用软的一手，搞“智育第提倡小绵羊学生，提倡没有文化就不能承担革命重担，这样错误理论，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徐景贤 1974 年 8 月 15 日在上海高等学校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

陶利本来不错，……他的行为本身，实际上就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种抵制和反抗。但剧本却硬说他“错”。他究竟“错”在哪里呢？无非是触犯了“师道尊严”之“礼”，越出了“智育第一”的轨道。

（初澜：《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摘自 1974 年 8 月 4 日《人民日报》）

中央领导（注：指“四人帮”）指出，这影片里所歌颂的情节、人物，都是错误的，歌颂的路线是修正主义路线，是搞“智育第一”、“文化至上”，对学生搞管、卡、压，或搞软的诱导，使他们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而最后培养的是资产阶级接班人。

（徐景贤 1974 年 8 月 15 日在上海高等学校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

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江青疯狂破坏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的贯彻执行。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周总理接见科学家李政道，当谈到文字改革的业绩和任务时，江青当场大放厥词，胡说什么“我们现在对不少简化字不认识，成了文盲。”对党的简化汉字方针和广大群众迫切要求简化字的愿望进行了恶毒攻击。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揭发）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建国初期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并指出，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群众又创造了许多新简化字，并迫切要求尽快公布新的汉字简化方案。在专业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努力下，制定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把《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报送国务院审批，国务院值班室收到后，于五月十九日送给当时主管文教的张春桥。但是，这个“四人帮”的狗头军师醉心于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竟把《方案（草案）》搁置一边，扣压达两个月之久。其间，他既不向主办单位了解任何情况，又没向周总理提出请示的具体问题和处理意见，竟以“文字改革史发展，我不太清楚”为借口，把《方案（草案）》推给了身患重病，正在治疗的周总理，狠毒地摧残周总理的健康。周总理当时虽然病重，九月中旬仍然仔细地审阅了这个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且还就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给了张春桥一个有力回击。

【批注】

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指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号召工农学好文化，指出：“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恩格斯早就说过：“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四人帮”与一切反动派一样，特别害怕劳动人民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害怕劳动人民学文化。他们公然鼓吹读书无用论，胡说什么：即使搞十年运动，学生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他们把主学与兼学对立起来，又把“以学为主”与“智育第一”混同起来，把“以学为主”和为革命学文化诬蔑为“智育第一”，挥舞“智育第一”的大棒到处乱打。围剿湘剧《园丁之歌》，把剧中的教师俞英采用启发式方法教育陶利为革命学文化，说成是搞“智育第一”，把陶利不学文化称作是“对修正主义路线的一种抵制和反抗”，就是个铁证。他们还反对毛主席关于“文字必须改革”的指示，破坏文字改革工作。

“四人帮”反对为革命学文化的极右实质在于：第一，从实际上剥夺或限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及其子女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权利，妄图使革命的阶级不能掌握马列主义的革命武器；第二，便于“四人帮”进行思想统治，实行愚民政策；第三，使文化继续为剥削阶级所垄断，成为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重要阵地；第四，使无产阶

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不能建成，而“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第五，使教育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总之，他们反对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学习文化，就是破坏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他们妄想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整个大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华主席指出：“要提倡为革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精逼业务，又红又专。”我们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华主席的这个指示，正确处理“以学为主”同“兼学别样”的辩证关系、划清“以学为主”同“智育第一”的界线，划清“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同在教育革命实践中由于缺乏经验因而安排不当的界线，在重视和改革课堂教学的同时切实办好校办工厂、校办农场，搞好厂校挂钩、社校挂钩，把主学与学全面安排好，把教育革命进一步搞好。

(2)

究竟我们这个地方解放十七年来是彻头彻尾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还是基本上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要承认始终是彻头彻尾，就不会动动摇摇，才会理直气壮。

（徐景贤 1970 年 11 月 18 日在中共华东师大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至于十七年，我们哪里占领过，不要说十七年，一百七十年也没占领过，一千七百年无产阶级也从没占领过。什么红线？黑线？无非是想得出我是比较好的结论，这是为个人辩护，但代表一股相当势力……

（张春桥 1970 年 12 月 23 日在上海市党代会大学组讨论时的插话）

从前大学，……因为它的整个路线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精神贵族。

（姚文元 1974 年 1 月间的一次谈话）

过去上音（上海音乐学院）不仅受刘少奇的教育路线的统治，还有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统治，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比其它学校更厉害，当然培养出来的人是资产阶级的吹鼓手。

（徐景贤 1976 年 1 月 19 日在上海体育馆座谈会上的讲话）

过去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要念一大堆书，他们说那是有用的，不读是不行的。实际上学生考试完了就忘了。要是忘了还好些，受毒少些，问题是有些没有忘。

（张春桥 1975 年 11 月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谈话）

如果按照你们的质量培养学生，只能对我国的经济基础起着很重大的反作用，破坏作用，……既然这样，我们又为什么不怀着无比仇恨的心理，把那些旧学校砸它个稀巴烂呢？

（张铁生 1976 年 2 月 3 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朱永嘉说：“要开门拆墙，把现在大学搞得越不象样，这才是真正的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函授组揭发）

什么是大学，大学就是大家来学。

（毛远新在 1973 年 3 月朝农会上的讲话）

“清华最基本的一条经验是开门办学”，“学校里留的人越少越好，同济的都走光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朱永嘉 1970 年 8 月 31 日在听取汇报五七公社工作时的插话）

学生参加“生产要纳入国家计划，学生三年固定在一个工程队里，新生来了重新考虑，产品、任务不固定没有关系，人固定就行。”

（姚文元 1969 年 5 月 19 日在同济大学的一次讲话）

1970 年张春桥说：“生物系不搞马、牛、羊，要彻底砸烂”，朱永嘉紧跟黑主子，对生物系的基础学科、理论研究和实验室建设进行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一九七三年朱永嘉说“动物学、人体及动物生理学专业，可以搞畜牧兽医”，又说“生物物理搞仿生学太渺茫”，强行取消基础学科专业。同时朱永嘉规定遗传学专业只能“以农业为方向”。当他听到遗传所还有医学（人类）遗传时，胡说什么医学（人类）遗传，谁愿意把自己的老婆拿去杂交。”

（复旦大学生物系教育革命组揭发）

朱永嘉在一九七〇年时就说：“生物系应该为大队一级培养人，学制一年就够了。”“生物系的实验室象大队一样水平就行了。”规定“教师每年要 70% 的人和 70% 的时间下农村。”

（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教育革命组揭发）

生物系为什么对学科那么感兴趣？学科说到底还是资产阶级法权，学科是为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安身立命之地有关。抱住学科不放就是抱住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强调专业、学科就是为个人主义服务，学校是资产阶级法权最顽固的地方。抱住学科不放的人一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专家，发展下去就是资产阶级分子，是改造的对立面。……应该发动搞加速器的教师搞柴油，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如果不愿去搞，至少是知识私有，把知识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

（朱永嘉 1975 年 2 月 27 日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讲话）

一定要冲破旧的学科框框，因为这是修正主义的东西。

（朱永嘉 1975 年 2 月 27 日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讲话）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六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汇报调研工作时，张春桥说：“我看历史、政教、中文、新闻、法律都可以不办。要办也只能办进修。”

（上海交通大学揭发）

搞专业化就会出现“个人开业”，走资本主义道路。

（迟群 1974 年 11 月 30 日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迟群以“砸烂旧清华”为名，滥用职权下令将水利系原有价值×××元的全国最大水利枢纽试验模型砸毁，致使全国许多单位无法进行试验。

（摘自清华大学《迟群、谢静宜反党言行一百例》）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朱永嘉一九七〇年七月公开说“我不赞成编写教材。”我校中文系提出要编写文学概论教材，朱永嘉借口“现在条件不成熟”，不让编。中文系要编写《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张春桥说什么：“不要搞什么《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把《鲁迅传》搞出来，斗争史也就有了”。在历史系、新闻系也是这样。

（复旦大学教育革命组揭发）

不要追求安定的教育秩序，……如果有一天恢复到过去的教学秩序，教材编得好好的，只要稍微备备课就行了，学生很听话，乖乖的，纪律很好，家长也满意，那末到了这一天，那也许是无产阶级教育灭亡的开始。

（徐景贤 1972 年 11 月 10 日在上海市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胡说：“毛主席只讲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讲过要建立规章制度。”

（摘自 1976 年 11 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大会发言材料之十四）

“他是不是初中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只要有毕业文凭就行了。”

“文化考查怎么考法，我没实际去做，拿不出办法。允许大家五花八门，都搞搞试验，省里不统一出题，各市、地去出题。我们保留一个批判权利。

（毛远新 1973 年 7 月 10 日在辽宁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的讲话）

国务院科教组、省委在这开现场会，一块大石头啊！同志们，你们知道不知道？拿这块大石头，打了人了！打得有些人坐立不安了！

（毛远新 1974 年 12 月 28 日在接见朝阳农业院院系两级党组织负责人和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批注】

几千年来，文化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浸透了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教学方针和方法也都是按照剥削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制定的。因此，要使劳动人民及其子女掌握文化，必须改革旧的教学方针，改革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四人帮”用唯心论代替唯物论，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破坏教学改革。他们把否定旧学校、旧文化中一切坏的东西改成否定一切文化知识，把批判地继承篡改成“彻底砸烂”。他们把反对读死书篡改成不要文化，不要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他们把反对旧学科体系中的唯心主义和繁琐哲学篡改成不要任何系的知识。他们把反对三脱离篡改成不要学习前人和别人的知识（即间接经验）；把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绝对化，同系统知识的学对立起来，至曲干与学的关系。他们把改革旧教材，改成不要教付。他们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教学秩序篡改成不要教学秩序，不要革命纪律。他们把反对考试以学生为敌人搞突然袭击，篡改成不要文化考查。所有这些，

都说明“四人帮”在教有上是教学改革的取消反对派，学校消亡派，反动的杜威实用主义源。

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这是从路线上讲的，从领导权上讲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照耀下，经过广大革命师生的努力，十七年的教有还是有进步的。“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的教育，完全是别有用心。他们用否定一切的办法来掩盖自己的极右面目，恰好暴露了他们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混在一起批、把广大革命师生同资产阶级捆在一起批的罪恶目的。他们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资产阶级是假，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广大革命师生才是真的。

(3)

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曾多次指示，要加强基础理论科学的研究工作。一九七二年春，《人民日报》约请周培源同志写了一篇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姚文元以“多征求意见”为名，长期扣压，送给迟群征求意见，迟恶狠狠地说：“谁叫你写？！”“不是我们的事，我不管。”在周总理指示“提倡一下理论”以姚文元派人转告周培源同志，说什么“现在要开展批林整风，这篇文章不宜在《人民日报》刊登，准备转到《光明日报》发表。”十月六日文章发表后，张春桥立即要《文汇报》批判，说什么“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之后，就在《文汇报》出现了许多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文章，说什么“资产阶级顽固势力以‘加强基础理论’为借口，刮起了一股‘智育第一’的妖风”等等。一九七五年底，“四人帮”又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黑文章中攻击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

（摘自教育部群众揭发材料）

周培源的文章是复辟的信号，是党内又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

（朱永嘉 1972 年在上海市的一次大专院校、科技界有关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九日，迟群讲：“有人听了杨振宁、李政道的讲话，就大做文章，真是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

（清华大学×××揭发交代）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正如人的两条腿，有时左脚在前，有时右脚在前”，“一会儿强调实践，一会儿强调理论，理论一实践，波浪前进。”

（朱永嘉 1975 年初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谈话）

一九七三年初，朱永嘉在一次会上说：“姚文元最近说过：‘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是最不懂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自然辩证法。’”

（上海复旦大学教育革命组揭发）

朱永嘉并告诉我，姚文元对这篇文章（注：指周培源同志文章）有批评意见是：基础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最基础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等等。于是，七二年十一月，我就在上海市中小学教材会议上，狠批了这篇文章，我胡说什么：最基础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基础的基础。现在有人大叫基础理论，实际上他根本不懂最基础的基础理论。

（徐景贤 1976 年 12 月 18 日的交代）

【批注】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并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在广泛的实践基础上，加

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指示。但是，“四人帮”疯狂反对周总理肆意破坏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诬蔑重视基础理论就是“刮‘智育第一’的妖风”，就是“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妄图通过否定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包括中学的数理化基础知识），来破坏教育革命，进而破坏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其实，“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这正是“四人帮”的哲学。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四人帮”妄图取消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他们根本不是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世界观、认识论降低到一般自然科学的地位，取消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

（五）篡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把开门办学引向邪路

一九七六年一月，教育部根据华国锋同志的重要报告中的要求，经过调查研究，起草了向中央和国务院报送《教育战线为普及大寨县作贡献的初步意见》，迟群多次反对写这个报告，说：“搞教育为普及大寨县作贡献毫无实际意义”，“学大寨的报告不要写了”。

（摘自教育部群众揭发材料）

暑假回去就是开门办学，说不介入，早就介入了，和走资派斗争不介入，抓什么纲？这不是理论脱离实际？这是最大的理论脱离实际，不要怕。

（迟群 1976 年 7 月 18 日与清华大学机械系压五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我校召开了第二次开门办学经验交流会，迟群在会上大讲所谓“深入批邓的方针。”迟群说：“放暑假，今年又是七、八、九，回去听一听，看一看，回来以后凑一凑。”“我们开门办学，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定不移，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不要畏首畏尾，缩手缩脚地，怕什么？无非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出了点毛病，喝几口水嘛。这也是锻炼。”“提高警惕，警惕谁啊？首先警惕走资派，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首先注意新动向。”

（摘自清华大学揭发材料）

（迟群）要学员暑假回到各地后，“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并说：“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大范围的开门办学”。

（摘自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

我们文科大学要办成写作组是对的。

（张春桥 1970 年 6 月 10 日在上海文科座谈会上的插话）

文科要办成写作组。

（朱永嘉 1970 年底在复旦大学文科座谈会上的讲话）

你们中文系，我只要两个月在报纸上看不到你们的文章，那你们的方向就有问题。

（朱永嘉在复旦大学一次文科座谈会上的讲话）

要把政治课教研组办成写作组，今后要把写文章多少作为考核教师的标准。真枪实弹写文章，参加战斗。

（朱永嘉 1970 年在复旦大学政治教研组教师座谈会上的一次讲话）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打着“结合战斗任务组织教学”的旗号，欺骗和蒙蔽师生，经常给师生布置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战斗任务”。例如：朱永嘉秉承张春桥的旨意，要编《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分析》一书，于一九七二、一九七三、一九七六年三次组织我校历史、新闻、哲学三个系的师生近一百人，分别去工厂、学校进行调查。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总理刚逝世，就组织政治经济系师生十多人，进行三个月的“外贸调查”，收集整理外贸方面的“黑材料”，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一九七六年六月，朱永嘉按照张春桥的黑指示，组织我校文科五个系师生近二百人，到上海郊区五个县进行三级所有制向两级所有制过渡的调查，扬言要编本象毛主席编辑《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一样的书。一九七六年八月，又组织我校教师和上海师大教师提前突击编写《战后世界史长编》中的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和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是如何下台的》两卷，为他们攻击华主席、党中央和篡党夺权作反革命舆论准备。

（复旦大学教育革命组揭发）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打着“以战斗任务组织教学”的幌子，大肆吹捧吕后、武则天，为江青当女皇造反革命舆论，并用儒法斗争代替和篡改阶级斗争的历史，要文科各系的教学均以批儒评法来组织：哲学系重编中国哲学史；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也要全部贯彻儒法斗争；国际政治系搞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实际上也是儒法斗争史，甚至要求共运史也要以前进和倒退，革新和保守的斗争为线索来讲；在世界史上也要挖掘儒法斗争的情况。

（北京大学教育革命部揭发）

“四人帮”的黑爪牙，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驱使北大经济系部分师生到市计委、外贸局去调查，找所谓崇洋媚外的事例，调查“大官”、“中官”的情况。调查结果全部交给“梁效”作为炮制黑文的材料。

唐山地震后，江青驱使北大文科哲学、中文、法律、历史、图书馆学等系师生到唐山到处批所谓“三株大毒草”，为“四人帮”破坏抗震救灾、妄图篡党夺权服务。

（北京大学教育革命部揭发）

唐山地震，迟群先说：“批邓是大局，抗震是局部，唐山是一百多平方公里，全国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后来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唐山煤矿涉及到全国的生产，影响大，我们去唐山是中央批准的第一个学校，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制定“唐山服务队”计划时，迟群说：“唐山去一个综合队伍，去得越多越好，搞个小基地，逐步扩大。”本来计划去的人数并不多，在迟的坚持下，先加到五百人，迟说不行，又加到一千人、一千五百人，还不行，最后加到一千九百余人，……九月份，建立“唐山服务队党委”时，派×××在党委书记，迟野心勃勃地对他说：“将来你在唐山市委还可以兼个职，第一把手不行，当个副书记也可以嘛！”

（摘自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

一九七五年底，迟群、谢静宜及其亲信驱使我校文科在大兴分校部分师生，借口开门办学插手大兴县农业学大寨运动，胡说县委工作队发动群众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是矛头向下，是扭转了斗争大方向向市委整黑材料，告黑状，并在下面撵走工作队，破坏了北京市郊区农业学大寨运动，造成极恶劣影响。

（北京大学教育革命部揭发）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九日，迟群布置教育革命部给他搜集整理一个北京市部分开门办学点上的材料，强调“特别要反映所在单位领导对运动的态度”，并说：“属于北京市的由谢静宜处理，属于其它各部委的由我处理”，“这个材料不要给其他人看，直接送给我，再直接上送。”

（摘自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

不直接参加部队的运动。如部队主动要求介绍运动，要积极支持，向他们汇报学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情况，各校要作好材料准备。部队团以上单位组织的大会，带队的同志要请示学校党委，由学校肯定人选汇报，连队组织的由班级选代表汇报。在和战士“五同”中，可积极宣传。

各校去学军时可带些邓小平等的奇谈怪论集以及学校的大批判选编，当部队干、战提出索要时可给予。

如部队使用大字报武器，我们也参加，如不写大字报，我们可出小字报出专栏。

（徐景贤 1976 年 3 月 8 日的一个“批示”）

【批注】

“四人帮”破坏毛主席“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示，不但反对“以学为主”，也破坏“兼学别样”，妄图把开门办学引向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邪路。他们对教育要为普及大寨县作贡献竟然认为“毫无实际意义”。他们对搞好学工、学农、学军，根本没有兴趣，对批判资产阶级更是恨得要命。他们要工农兵学员“介入”所谓“和走资派斗争”，“要把政治课教研组办成写作组……真枪实弹写文章，参加战斗”，说中文系只要两个月没有在“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上发表文章，“方向就有问题”，等等，就是妄图驱使师生为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效劳。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说明，他们正是这

样做的。凡不照他不这套办，就诬蔑为不抓“纲”，是“最大的理论脱离是实际”。这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帮”所谓的“开门办学”，根本不是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之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之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之门，而是要开复辟资本主义之门。

（六）破坏革命的师生关系

迟群说：“教师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根北京东城区教育局和北京市 166 中揭发）

要通过××把教师队伍整顿一下。

（谢静宜同中关村一小支书和某班主任的一次谈话）

你××敢提意见就是最好的革命纪律……

（迟群 1973 年 12 月 5 日接见××时的谈话）

迟群对那个小学生说：“你的老师再坚持错误立场，就把他打成右派。”

谢静宜则打电话给学校党支部，指令“要有棱角，对班主任老师不要太手软了。”

（摘自 1977 年 3 月 17 日《光明日报》《提倡尊师爱生搞好教育革命》）

他不欢迎的东西就叫乱，象××敢给老师贴大字报，他就叫乱，我们说就是要乱，乱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列宁说过，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你搞修正主义，他就去搞无政府主义。将来说你教育局是最大的教唆犯，你跳在黄河里也洗不清。

（毛远新 1974 年 2 月 20 日在鞍山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学校秩序乱是正常的，……乱是知识分子造成的。

（毛远新 1974 年 4 月 11 日在辽宁省教育战线工宣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如果说（青少年犯罪）一段时间里多了些，我说正是学校里某些领导干部和教员，一个是公开怠工，一个是坚持资产阶级偏见造成的。

（毛远新 1974 年 4 月 9 日在辽宁省教育战线工宣队工作会议上对会议领导小组和各市、地负责同志的讲话）

有些学校的纪律乱，……对原因的看法不一样。我们说，正是你资产阶级的两手，一是怠工，一是坚持资产阶级偏见造成的。

（毛远新 1974 年 4 月 9 日在辽宁省教育战线工宣队工作会议上对会议领导小组和各市、地负责同志的讲话）

我们要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可没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得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培养。……你要我干，就坚持资产阶级偏见；你一批判，好，咱们不干，怠工，你来干吧！你说我讲的不行，你来讲讲看。……现在，我们遇到的教师也是这两手，要末坚持资产阶级偏见，一批判，就躺倒不干。

（毛远新 1974 年 4 月 11 日在辽宁省教育战线工宣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大学教授的师道尊严比中小学更厉害，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他们是王道、霸道并用者。

（毛远新 1974 年 1 月 18 日在关于批孔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四年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个知识青年用“王亚卓”的笔名给××写信，提出“我们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不要看到指责老师的文章，”，

“关键是矛头指错了”。迟群在信上批：“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

（《北京少年》一同志揭发）

“四人帮”在某报社的那个亲信看到所谓《一封公开信》后，如获至宝。他……在二月七日亲笔给姚文元写了一封信，将《一封公开信》和“编者按”送姚文元审阅。姚文元当天就作了“批示”，吹嘘《一封公开信》“回答了些责难，写得也有力”。随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一齐上阵，在姚文元的“批示”后面“批示”：“同意”。江青还写道：“建议版面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于是，隔了一天，这封《公开信》就在报纸上以“突出”的地位对王亚卓进行“围剿”了。

（摘自1977年3月27日《解放军报》《“四人帮”蓄意制造的桩政治迫害案——王亚卓事件真相》）

【批注】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拥干爱兵”。敬爱的周总理也提倡提要尊师爱生。

“四人帮”把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方针、方法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方针、方法的矛盾篡改成师生的矛盾。在批林批孔中，他们别有用心地打出批判“师道尊严”的旗号，把“师道尊严”当作学校批林批孔的主要矛盾，把教师当作“复辟势力”来批，转移了批林批孔的大方向。他们对教师不作阶级分析，违背毛主席关于依靠积极分子，团结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的一贯教导，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搅乱革命阵线，破坏无产阶级的师生关系，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妄图把广大教师推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去，使社会主义的学校一片混乱，教育革命无法进行。当他们把学校搞乱以后，又采用强盗栽赃的手法，倒打一耙，说这些都是教师造成的。如果有人持不同意见，他们就用“糊涂虫”、“反革命”等帽子压下来，大逞其“帮道尊严”的反革命淫威，实行法西斯专政。“四人帮”的死党毛远新，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学校仍然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正说明他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教育阵地上的胜利成果，否定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他们讲的“在学校里边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就是要对教师进行专政。

（七）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你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骂一顿臭知识分子，不要以为风平浪静了，没有事了，首先一点，是同志们不要轻易相信他们。

（王洪文 1973 年 9 月 20 日接见总工会常委时对业余工大的插话）

俞英、方觉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都是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园丁之歌》把俞英、方觉这样的教师奉为“树人”的“园丁”，甚至称之为“引路人”，大加美化和颂扬，其实质就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而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

（初澜：《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

摘自 1974 年 8 月 4 日《人民日报》）

文化大革命前是有教训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

（迟群 1974 年 12 月 23 日在学习朝农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上的讲话）

不久前，他（注：指迟群）在清华大学还提出，知识分子是“知识私有化、经营个体化、成果商品化”。

（毛远新 1976 年 1 月 1 日的一次谈话）

世界上石油缺，石油涨价，粮食缺，粮食涨价，现在书虫子（注：指知识分子）爬出来，要高价。

（毛远新 1974 年的一次讲话）

几年来骂臭知识分子，他们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炫耀知识，压工人，应该骂臭知识分子。

（张春桥 1971 年 1 月 15 日在上海文化广场的讲话）

知识分子舒服，工宣队就不舒服。

（毛远新 1974 年 2 月 20 日在鞍山的一次讲话）

如果大多数人（注：指知识分子）开心，说明我们的教育革命失败了；大多数人心情不舒畅，说明教育革命是成功的革命，就是要大多数人感到不舒服，对教师的改造就象水中按皮球，压压，下去了，一松手，又上来了。

（徐景贤 1972 年 12 月 26 日在华东教材筹备会上的讲话）

（知识分子）“你稍微一放手，他就按资产阶级那一套干，你一批评他就消极怠工”。

（毛远新 1974 年 4 月 11 日在辽宁教育战线工宣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不要做那个苍蝇，一个圈子又兜回到原地。文化大革命的激水洪流，把我们冲起来了，不要以为现在洪流过去了，兜个圈子回到老地方去。

（朱永嘉 1973 年 5 月 10 在上海市教材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徐景贤说：“有的教师说，射向资产阶级的子弹总是从我们教师身上穿过的，这句话有部分对，……。”朱永嘉插话：“射向资产阶级的子弹从教师身上穿过是对的……”

（复旦大学生物系揭发）

今年暑假招生怎么招，不要招进来的是好工人，送到豺狼虎豹之口就要被吃掉……

（张春桥在 1970 年 1 月 11 日上海康平路办公室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次批林批孔，……教师中间的问题可以揭，教师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一有气候就要表演表演，将来他还要表演，这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相当长决定的。

（毛远新 1974 年 4 月 9 日在辽宁省委召开的工宣队工作会议上对会议领导小组和各市、地负责同志的讲话）

现在有的教师说，现在外国文献也看不懂了，好象很可耻，崇洋媚外，要批判。

（朱永嘉 1973 年 11 月 24 日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讲话）

上海骊山中学两位教师在向党支部汇报思想时，对教育革命的问题提了一些意见，“四人帮”和马、徐、王一齐出动进行迫害，王洪文下黑批示，污蔑这两位教师是右派，徐景贤亲自去学校督战，批斗这两位教师达半年之久。

（上海市教育局揭发）

不承认世界观是资产阶级（注：指教师），人家资产阶级一上台，就跟着干呀，一复辟，就跟着跑呀。

（毛远新 1974 年 2 月 18 日在鞍山四中的讲话）

也就是说这样一些人（注：指教师队伍）可以这么估计他们，不论是哪个社会，不论是哪个国家，不论是哪个阶级掌权，他们都可以凭着那点知识、本钱混饭吃。恐怕苏修打到中国来时，他们还可能打着白旗上街去欢迎，这可没准。假如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话，恐怕他比现在还高兴，比现在搞教育革命还适应，比现在还吃香、卖力、挣钱还得多，这个恐怕是事实吧！我那么想到那个时候，如果真的变了天了，他们就不可能再喊毛主席万岁了，也不敢再喊共产党万岁了。他们要喊谁万岁？咱就不知道了，恐怕谁统治中国他就喊谁万岁，这有什么办法？世界观决定的。

（张铁生 1976 年 1 月 28 日在北大的讲话）

我们必须大胆地把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从我们的教育领导岗位上赶快撤销，……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党内堆集的垃圾清除出去，新鲜血液才能充实进来。如果我们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各个单位都能照这样做，我们看形势一定会大好的。这样做也不是我们独裁，这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

（张铁生 1976 年 2 月 10 日在太原市湖滨会堂的讲话）

【批注】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但是，“四人帮”反对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他们把旧教育制度同旧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混为一谈，完全抹煞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对于社会主义事

业所起的积极作用，全盘否定了现有的广大知识分子。他们敌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把知识分子当作“苍蝇”去轰，当作水中的“皮球”去压，当作“垃圾”清除出去，甚至鼓吹“射向资产阶级的子弹”要“从教师身上穿过”。这真是修正主义怪论，荒谬透顶。他们妄图通过否定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扼杀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来达到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罪恶目的。什么“革命，就是要大多数人感到不舒服”，这就清楚地说明他们是“一小撮”。至于张铁生在北大骂知识分子的话，诸如苏修打来了，知识分子“还可能打着白旗上街去欢迎”等等，那不正是“四人帮”及其干将、爪牙们的自我写照吗？

（八）反对党的领导

去年，我们开了一个工宣队座谈会，他们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不怕，我们最怕的是学校的党的领导、党的干部、共产党员不和我们工宣队坐在一条板凳上，反而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在一条战壕里对付我们。我觉得这个意见非常中肯。……更重要的是敢于向各级党委（包括省委在内）、各级教育部门的错误路线坚决斗争。

（毛远新 1974 年 4 月 11 日在辽宁省教育战线工宣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从大学组织工作考虑，长期搞学校工作的人，再搞学校工作不一定合适，要另找外行，如县委书记、厂党委书记来交流一下，把厂党委书记换一换，学校就是要外行来管，一内行就变过去了。

（毛远新 1973 年 12 月 1 日在辽宁省高等院校工宣队代表座谈会上的插话）

今天，我们办教育，也是在搞阶级斗争，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婆婆妈妈的哄着来，不能放弃了无产阶级的原则。咱们学校就根据辽宁省委的指示精神，要对农学院的领导班子动一个大手术，听了之后，特别特别高兴，这个大手术我们动啦！现在还正在动。我们彻底地改组了过去的领导班子。……还有的人要把那位老院长请回来。我们说请这位老院长，你们就别想啦。被你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念念不忘的那位老院长，我们派他回家抱孩子去啦，连顾问也不让他当，……下决心动手术就动这么一次，不光院一级的领导班子要动，中层的班子也要动，下层的班子还要动，一句话，这样做就对了！上层建筑部门，必须大胆百倍的采取组织措施，改变阶级成份，加强党的班子建设。

（张铁生 1976 年 2 月 10 在太原市湖滨会堂的讲话）

党委路线不端正，你们就轰，目标是要革命。你革命，我也革命，就到块来了。有个不革命的，唱对台戏也好，经常提醒我们。

（迟群 1976 年 10 月 6 日在清华大学团委和上管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你（注：指工宣队）要去斗。不斗，下一次就要骑在你脖子上拉屎，……要打进攻仗，不要光是防守。

（毛远新 1973 年 12 月 1 日在辽宁省高等院校工宣队代表座谈会上的插话）

和知识分子斗我们不怕，我们怕的是教育部门共产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同志，屁股坐在知识分子那边，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话。

（毛远新 1974 年 2 月 20 日在鞍山市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

你党支部是带头复辟，支持教员搞资本主义。

（毛远新 1974 年 2 月 18 日在鞍山市四中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校党组织不起作用，不起好的作用，最讨厌，成天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服务。……向资产阶级投降。

（毛远新 1973 年 12 月 1 日在辽宁省高等院校工宣队代表座谈会上的插话）

那几个党员，都是从知识分子里提拔的，不代表工人阶级就代表资产阶级。他们能代表共产党，工宣队就不能代表共产党？

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教育局，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边。

工宣队要在党的领导下，这完全正确，但是不是在党支部领导下，看你们是什么路线……

（毛远新 1974 年 2 月 20 日在鞍山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所以开这个会，不光是解剖教育战线，对其他战线也有好处。今天开这个会，请些青年同志来讲，恐怕有些话不大好讲，刺耳一些，但听了有好处。今天给会议吹进点“氧气”进来了，给你们市委吹了“氧气”。

（毛远新 1974 年 2 月 20 日在鞍山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工宣队要注意把学生工作做好，利用这股力量，别让人家弄过去整你，要把这个工作做好，要注意培养一些人，从政治上、能力上、业务上，选好的，毕业后留下来，到系里当支部书记，把这些人提起来就好办了。

（毛远新 1973 年 12 月 1 日在辽宁省高等院校工宣队代表座谈会上的插话）

当×××建议学校要掺砂子时，毛远新说：“掺那些浑身是刺的砂子。”

（毛远新 1973 年 12 月 1 日在辽宁省高等院校工宣队代表座谈会上的插话）

工宣队还要不要？工宣队进校四年多了，算不算长期？我理解什么是长期呢，三年、五年是不是长期？我认为是长期啦！……

什么时候撤？……工宣队撤是肯定的，在第四个五年计划内。还要把工人讲师团考虑进去。

（张春桥 1972 年 10 月 24 日在上海市工宣队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你们是工农兵学员，还要什么工宣队，你们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嘛！

（张春桥 1972 年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和知识分子混了多年，也没有被腐蚀过去。我知道你们水平低解决不了……

（张春桥 1972 年 10 月 24 日在上海市工宣队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工宣队不能长期留在学校，以后是要撤的，这一点你们心中有数就行了。

（迟群 1972 年 7 月批阅简报时的谈话）

复旦不要搞（工人专职教师），搞了不好，成了包袱。

（朱永嘉在 1973 年教材会议上听上海师大文科汇报时的讲话）

首先咱们工宣队也是有问题的，在工厂里边当工人，在工厂的机关里当干部，习惯于作机关工作，事务工作，所以这个旧框子就带到学校来了。农村来的同志也是如此。

（张铁生 1976 年 8 月 29 日在铁岭农学院应届毕业生上的讲话）

【批注】

加强无产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根本保证。毛主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又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

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四人帮”拚命反对由无产阶级掌握学校的领导权。他们反对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攻击学校党组织，挑动工宣队、工农兵学员与学校党组织的对立；歪曲“上、管、改”的革命内容，成立“上、管、改委员会”，凌驾于学校党委之上。他们打着“向错误路线坚决斗争”的幌子。号召“轰”学校党委，攻击各级领导干部，妄图层层篡夺党的领导权。他们叫喊要“改变阶级成分”，就是要把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赶下台，而由紧跟“四人帮”的人上台。明明是他们首先下令撤销工宣队，反过来又诬称别人要撤销工宣队。他们反对党对学校的领导，反对工宣队、贫管会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政治作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教育革命。粉碎了“四人帮”，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的领导，搞好整党，加强党的建设，把教育革命搞得更好。